

「讓我們彼此看見」

——觀艾曉明、郭建梅獲 西蒙娜·波伏娃獎有感

● 劉文瑾

2010年1月12日下午，我和幾位中國朋友一起去巴黎第七大學參加一個特別的活動。

今年的西蒙娜·波伏娃獎(Simone de Beauvoir Prize)頒給了兩位中國女士——艾曉明和郭建梅，以鼓勵她們為了維護女性(和男性)的基本權利而做出的卓越貢獻。對於這樣的消息，國內媒體一定是聾啞的，不僅如此，「有關部門」還會想方設法地設置障礙：艾曉明女士無法辦理護照前往巴黎領獎，她只有通過在遙遠的中國寄書一封〈雪天裏落下的五月花——我的獲獎感言〉來表達自己的感受。於是我們，這些正巧呆在巴黎的中國人，就只好在這個本應艾曉明親自發言、親身體會她的艱難付出所獲得之「榮耀」的地方，來見證這一事件並分享我們的感受。

西蒙娜·波伏娃獎全稱「西蒙娜·波伏娃女性自由獎」。這個獎是於2008年1月紀念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誕辰100周年之際，在法國著名學者、當代女性主義三大代表之一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倡議之下設立的，目的是鼓勵世界各地為女性自由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人和

行動。該獎成立以來頒發過三次。第一次於2008年分別頒給了非洲裔前荷蘭議員阿里(Ayaan Hirsi Ali)女士和孟加拉女作家納斯琳(Taslima Nasreen)。這兩位女士由於批評伊斯蘭極端主義(尤其是它對女性的壓迫)而被追殺，不得不長期逃亡異鄉，至今不能還鄉。被迫幽居在印度的納斯琳甚至無法循正常程序前往巴黎領獎，為此還得勞動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去游說印度政府，最終她還是不得不延後好幾個月才到達巴黎。

2009年的西蒙娜·波伏娃獎頒給了一個集體行動——伊朗婦女們的「百萬簽名反對歧視婦女法律」，由伊朗著名女詩人貝巴哈妮(Simin Behbahani)象徵性地代為領取了這一獎項。2010年伊始，這個獎意味深長地拋向了寒冬裏的中國。克里斯蒂娃在發言中說：「今天，中國帶給人們的恐懼感並不亞於它的吸引力，而在這樣一個國家裏，婦女們卻無畏地想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艾曉明的獲獎是由於她這些年來所參與的「捍衛人權的行動」以及她所

拍攝的有關紀錄片。艾曉明的名字對中國的知識界來說不會陌生，這位若干年前廣州中山大學的紅人、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主任，現在大概更加願意以「獨立紀錄片製作人」的身份自許。不知從何時起，中大中文系的網頁上已經找不到「艾曉明」了，反差之大，令人唏噓。

公益律師郭建梅的獲獎則是由於她在法律建制方面為捍衛女性權力作出的重要貢獻。郭建梅自1995年起開始主持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這個中心所代理過的無數案件的案主，正是艾曉明攝製的紀錄片中所呈現的那些社會弱勢群體成員。作為一個NGO組織，這個中心克服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和壓力而成長，然而，不久之前，郭建梅卻被迫和這個中心一道從北大撤離。

不同於任何別的國際獎，這樣一個獎項是沉重乃至苦澀的，沒有勝利者的興奮可言。這裏既看不見電影節上的風情萬種，也不會像諾貝爾文學獎那樣，引發嫉妒、爭議、憤憤不平；既沒有閃光燈和鮮花頻送秋波，也沒有才智之士侃侃而談。這是怎樣的獎勵？沒有人敢去對它「覬覦」或者「角逐」。它所鼓勵的，並不是個人的才幹或智慧。如果我們只看到了它的榮耀，那麼我們就離它還太遠；如果我們僅把獲獎者當作「英雄」，那麼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體會「英雄」背後的命運和悲劇；如果我們像某些人那樣，把它看作羞辱和西方世界的敵意，那麼我們就還依舊深陷於自我意識的焦慮，而沒有看到，今天真正在羞辱我們的，首先是中國人自己的行徑。

會議正式開始之前，我們先觀賞了一段艾曉明拍攝的紀錄片《關愛之

家》。這個片子反映的，是河北邢台因輸血導致艾滋病的患者們的維權經歷，或者說是血淚史。這是從國內的正式渠道無法得知故事。躍入眼簾的，是我們來巴黎後，在視覺上久違了的中國民間生活：那些簡陋的小屋、土路、家什；那些粗糙的面龐、衣着、鄉音；那些活生生的血迹、淚水和疤痕……當然，還有屏幕所無法呈現的死亡、人們內心的創痛，以及邪惡的頑固。一位受害者家屬，灰頭土臉的老太太，一見到她家進行調查的民間維權人士就痛哭下跪，說：「都怪我把孩子送到醫院裏，給你們添麻煩了……？」她的媳婦是在醫院裏生孩子的時候經由輸血感染艾滋病的。醫院的惡行不僅在於醫療衛生上的失職，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為了牟利而行騙，在根本不需要的情況下讓產婦輸血，導致母子雙雙感染。這樣的事情當然不是只有一兩起。然而對於如此昭彰的劣行，醫院不僅拒不認錯，還僱兇恐嚇毒打膽敢問責的病人和家屬。可憐的中國老百姓承受着天大的冤屈，申冤無門，還不忘自責和「感恩」。他們習慣性地把希望寄託在個別「父母官」、「青天大人」的身上，他們深感自己卑微無力，他們痛不欲生，他們磕頭下跪……而對此，我們的社會卻有意無意地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正是對這樣一個幾近麻木的社會，艾曉明呈上了自己缺席的發言：〈讓我們彼此看見——寫在巴黎放映之前〉。這個發言讓我明白：一個功成名就、正值盛年的學者，為甚麼捨得放下自己熱愛的學術事業和講台，放下對於一個女性而言尤為來之不易的這一切，冒着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險，而毅然扛起攝像機。她說：

推動我走上拍攝紀錄片道路的，就是這個婦女〔黃靜〕遭受暴力案。我唯一的想法是：讓我們彼此看見。我們要看見，如花的生命怎樣遭受凌辱，又如何因對婦女暴力的漠視以及司法不公，死無葬身之地。我在那裏，用了古琴曲『胡笳十八拍』來襯托一位母親與兒女生離死別的哀慟，但這只是一個方面；由這悲痛所激發出來對社會公正的爭取，是這部紀錄片的靈魂。這是血與琴、記錄與藝術不可分割的關係。

……

我還應該說，我特別感謝成為紀錄片工作者的命運，它使我學會了觀看、體會和理解：在我們這個艱難的社會，婦女們承受了何等的痛苦。在《中原紀事》裏，河南艾滋村的女性，當年因為所謂的「血漿經濟」的興起而捲入有償獻血，隨後感染艾滋病；在《關愛之家》中，女性因為在醫院生孩子被輸入污染了的血液，從而母子雙雙感染；在《我們的娃娃》這部片子裏，父母們為孩子葬身豆腐渣校舍而痛不欲生……我個人完全沒有能力承受這一切，這使得我在編輯線前一次次淚流滿面。

坐在現場，聽着用法文傳達的中國人的心聲，我沒想到會是這麼美！這個聲音飄響在會場上空時，我驚呆了。熱愛法蘭西精神的我，以前總是羨慕法語當中蘊藏的豐富思想和激情，而今天，我在被轉譯的母語裏，發現了毫不遜色的美和聖潔！我的被「劫持」了的母語，當她被釋放之時，她煥發出一種多麼動人的力量，這種力量令法語也為之一振。是啊，所有古老的語言都在等待生機勃勃的靈魂來更新它們。這種生機勃勃的靈魂，

即便來自異鄉，即便使用地球另一端的腔調和語法，只要她所攜帶的是人類對愛和正義之渴望，她的力量，都是不可泯滅的。

回頭思量艾曉明的發言標題「讓我們彼此看見」，我體會到其中的雙關。如果說在漢語裏，「彼此看見」也可以說成「彼此相顧」的話，那麼，「讓我們彼此看見」也就可以表達為：「讓我們彼此相顧」。同樣，在西語（英、法）中，「看」和「看見」的區別以及區別的理由是十分明顯的，尤其當「看見」是用於討論人的道德判斷力和敏感力問題之時。在現代社會，人的「原罪」往往不是無知，而是「視」而「不見」。我聽到過不同的西方學者強調：只有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有「顧念」、「顧惜」之時，才能真正「看見」對方；反之，當一個人真正「看見」了對方時，又怎能沒有對他的「顧念」和「顧惜」？在此，我們不能不讚歎漢語的深厚蘊藏，不能不感到：人類的精神在其偉大之處，往往都是相通的；人類並不必然只有巴別塔後裔的命運，並非只能自說自話。

然而，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這種「看見」的渴望卻引起了當局的恐慌，以至於以損害國家利益為由阻止艾曉明出國領獎。這說明大家都明白，對於社會生活，「看見」裏面包含了一種不可小視的力量——記憶和見證。這種力量來自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正是這種渴望推動着我們追問、反思和講述。我想那推動着艾曉明放下一切來做的，就是這種使命感：見證現在的事情，至少可以給未來保留一份記憶，而這記憶是不可或缺的遺產，它可以幫助未來的人學會更好地生活。篡改或抹殺記憶，既是對今人的不公，亦是對後人的掠奪。

以西蒙娜·波伏娃命名的這個獎項，其設立自然離不開以知識捍衛人道主義精神、以人道主義精神來體現知識的意義這樣一種雙重取向。這也是巴黎七大校長在會議開場白時就強調的大學的定位，以及在大學裏支持這樣一個獎項的意義。毋庸贅言，今天，這樣一種對知識、知識份子以及大學的定位，在中國愈來愈受排擠。且不說當下中國知識界對待學術的「GDP心態」，亦不論知識精英們的投機和墮落，單看艾曉明、郭建梅這兩位大學人遭受的來自校方的擠壓，便可了了。作為一個曾為母校的傳統深感驕傲的北大人，郭建梅在現場的演講中表達了她對中國大學的遺憾和擔憂：中國的明天，知識、知識份子和大學將會淪為甚麼？

在我看來，尤為可敬的是，郭建梅的擔憂並非出於一種知識份子的精英意識。她謹慎地將自己定位為「維護司法公正的普通律師」，一位盡律師「本份」的「現行制度的建設者和維護者」，而不是「體制的批評者和抗議者」。她小心地糾正了法國人稱讚她時所用的詞語，雖然這樣的詞語在民主國家被習以為常地當作知識份子的光榮使命。這一糾正提醒在座各位，她是在一種怎樣的處境之下來做「維護司法公正」的艱難事業。我們也意識到，當給自己定位為盡「本份」時，她是從一個多麼謙卑樸實的立場出發：她完全沒有知識份子們的被自己製造的意識形態幻覺所吊起來的野心和胃口。她沒有發表自己的高言大志，而只是談論她所經歷過的人和事，談論她目前所遭遇的具體處境和困難。作為一個戰鬥在第一線的律師，她深深意識到，只有面對具體的處境和困難，才能給具體的人事提供真實的幫助。而她本人的具體處境卻是：假如

她不是把十多年的時間和精力奉獻給公益律師這一行，假如她把這些付出來做學問或掙錢，她今天的境遇會截然不同。在她用自己的行動來詮釋的「本份」這個詞裏面，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驚訝的耐心和堅忍。今天，只有這種力量才能夠改變中國。

以前我以為，思想和書籍能夠讓人日復一日面對平庸的現實而不會變得平庸，但生活讓我看到的情況更加複雜。知識和野心、知識和貪欲的弔詭使我們無法輕易相信飽學之士的娓娓言辭。隨着年歲漸長，我開始變得更願意相信人的「本份」，相信生活中的「小小的善」，而常常對知識份子的理念抱有世故的疑慮。疑慮或許讓人缺乏激情，卻也能幫助我們活得更為真實：學識需要轉變為日常生活中小小的善，而不是成為精神鴉片乃至政治投機的資本。於是我想到了：大學既不應當只是獲得學歷、謀求生活資本的地方，也不應當只是寫詩做夢展現抱負的地方；大學應該首先是一個讓人們學會「彼此看見」的地方，不僅能「看見」認識的人，也能「看見」陌生人。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詩中說道：「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這兩句詩體現了漢語傳統起興的修辭方式——從自然到人倫，而我想說，假如我們能夠顛倒一下這個順序，假如我們先「為陌生人祝福」，或許我們也就能夠「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我們多麼願意，這個名字是「中國」。

向兩位女性致以深深的敬意。

劉文瑾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
研究院講師、文學博士。